

校庆六十周年专栏

校庆六十周年专栏

校庆六十周年专栏

陈 洪

忆萧友梅先生

与抗战初期的上海国立音专

我与萧友梅先生共事从1937年8月起至1940年12月止。这段时期就是我这里所说的“抗战初期”。《音乐研究》和《音乐艺术》编辑部要我写这段史料，史料贵在客观与真实，但我手头几乎完全没有当时的资料，现在只能搜索枯肠，点点滴滴地回忆出来，遗误在所难免，也难免有主观成分，务请同志们加以谅解和给予指正。

第一个印象

1937年仲夏，我在广州突然接到萧友梅先生自上海音专的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去上海音专工作。七月下旬我第二次接到他的来信并附聘书，聘我当音专教授兼教务主任。我和他素昧平生，他从何知道我的？何人介绍的？我至今还不了解，也从来没有去追问过。

这已是芦沟桥“七·七”事变之后，淞沪一带形势紧急，烽火迫在眉睫了。七月底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经香港乘船赴沪，按期于8月1日到达，当天我就到“市中心”国立音专去报到。

“市中心”位于上海北郊江湾区。国民党政府原欲在上海租界的周围建立一个“大上海”，并选定江湾为“市中心”，市政府就设在这里，又号召各学校在江湾建校，音专于1935年在市政府附近新建了校舍。这里环境优美，人烟稀少，空气新鲜。新建的校园相当美丽，如果加上荡漾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那就的确有点象所传闻的“象牙之塔”了。但我到达的第一天却什么声音也没有，一片寂静。我急步走进大门，便看见一座三层主楼，面对着大门，主楼前竖立着一支高高的旗杆，旁边有青翠的松柏，树下一块石碑刻着“蔡元培先生手植”。主楼

是办公室和大大小小的教室，右边连着一个演奏厅，厅中有一个矮矮的舞台，结构也颇精致。楼里似乎没有人，我却找到了我的办公室，因为门上已贴上我的名子，只是没有钥匙进不去。我便走出这座楼去找萧先生的寓所，楼外的学生宿舍和琴房等则无暇参观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入音专在江湾的校园，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不久它就被日寇占领了。

萧先生的寓所离校不远，是他租赁的一座小洋房。附近还有若干座类似的小洋房，也都是音专教师住的。萧先生在他的客室中会见我。他约有五十出头，中等身材，瘦削，头盖显得大而下巴尖，颧骨突出，戴黑框眼镜，双目炯炯，胸部扁平，不时咳嗽，一望而知他身体欠佳，可能有肺病。他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当他发现我普通话说得不好时，便改用广东话和我交谈。他原籍广东中山县。

寒暄之后，话题立即转入搬场。他说：“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明天就搬。音专在搬到江湾之前，自己没有校舍，那时在上海租界内就是东搬西搬的，搬场是音专的家常便饭。”话题转到我的工作问题，他嘱我暂住法租界亲友家里，明天搬场后在新校址会面详谈，我便向他告辞。这次他给我留下一个印象是：说话坦率、不事掩饰，虽健康欠佳，但有魄力，对时局并不胆怯。我被他这种精神所鼓舞，对音专的前途也就乐观起来。

“搬场是音专的家常便饭”

8月2日，音专由“市中心”搬到法租界的徐家汇路来了^①。不久又搬到马斯南路，后再搬到高思路，最后搬到爱文义路，两年内搬了四次。我索性

^① 本文所用的路名都是当时的旧路名。

在这里专门叙述一下搬场的事。

徐家汇路原有一家私人的骨科医院,停业了,音专租下它的房子作为避难校舍。这里是法租界的西南隅,隔一条小小的河浜就是“中国地界”了。音专这时只有一百多学生,全部走读,房屋勉强够用。我同注册科凌宝珩先生(女)把课表排出来,文化课和专业课都能开,只停开了政治课和体育课。凌先生有眼疾,只能用一只眼睛工作,而工作效率很高,为人忠实可靠,认真负责,(可惜于前两年去世了!)在事务工作中,则多得力于当时的工友王浩川同志,他是一位很老实而肯干的同志,听说他目前仍在上海音乐学院。

在徐家汇路这个“偏安之隅”维持不到半个月就有变化了。8月13日星期五(迷信的人说这是个不样的日子)傍晚,我独自在辣斐德路向东走,抬头望见一架国民党的飞机正在空中盘旋,它突然扔下一枚炸弹来,我眼见炸弹落下,并隐约听到轰的一声响,第二天才知道炸弹落在最热闹的大世界广场上,死伤了许多人。据说它原是要去炸日本鬼子的,因技术失误,炸弹落到同胞头上来了。接着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租界周围展开战斗,短兵相接,枪声卜卜可闻,骨科医院与战场仅一浜之隔,在楼上可望见两军对垒和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伤心情景。日寇还向法租界开枪,打死了在河浜沿岸水塔上看热闹的一名白俄。至此,骨科医院已处于危险地带,音专乃不得不作第二次搬场。这次搬到离“中国地界”稍远的马斯南路,在哪里租下了一所较大的住宅作为校舍,虽勉强能上课,但比起骨科医院来就更局促了。

几个月后,萧先生认为过度集中则容易引起敌伪的注意而被一网打尽。因此他提出“化整为零”的方案,实行第四次搬场。法租界西头有一条僻静的高恩路,音专在这里租了一座三层楼的洋房作上课用,另在福履理路租一层楼房供总务部门使用,又在西爱咸斯路租一层楼房,用以贮藏图书和唱片。萧先生每天在图书室中办公,兼任图书管理员。每天到这里向他汇报工作,这样度过了1938年和1939年的大半年。

上海滩上的谣言越传越盛,传说日本人有可能先拿下法租界,对公共租界还不敢遽然下手。同时高恩路的邻居嫌我们吵闹,要求安静,我们乃决定撤离法租界,在公共租界另觅栖身之所,于1939年冬第四次迁至卡德路口爱文义路的一座破旧楼房

中。这里环境异常嘈杂,门外的有轨电车终日车声隆隆,严重妨碍上课,音专的处境是每况愈下,在这座破楼中几经风雨,直到抗战胜利。

在“孤岛”中

“八·一三”以后,上海租界与外界的地面交通统统被切断,于是租界变成了当时上海人所谓的“孤岛”。音专的经费按月由国民党政府从汉口(后来从重庆)通过地下钱庄汇来,公文也能通过国民党的地下组织传递。日本人和汉奸不但在租界外无恶不作,迫使大量难民流入租界,而且在租界内也不断制造恐怖事件,暗杀和绑架的事时有发生。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就是于1937月底(或1938年初)在马路被暴徒杀害的。这时期上海几所国立学校的负责人每月举行一次秘密碰头会,借以交流情况,研究对策。音专总是由萧先生和我去参加,有时我单独去。交通大学出席的是黎照寰校长,复旦大学是杜佐周教务长,医学院是颜福庆校务长,此外还有暨南大学和商船学校等代表。这几所国立学校都没有迁入内地,后来在内地陆续开办起来的交通大学、复旦大学、音专,都是另起炉灶的。

尽管环境如此险恶,音专还是积极地做了一些事。在高恩路校舍中补行开学典礼时萧校长说:“我们不要悲观……今年十一月是我们音专建校十周年纪念日期,回想以往十年中各种困苦艰难的情形,本来要在今年举行一个规模较大、较深刻的会来纪念它,但这件事目前自然谈不上了。我们的校舍虽在炮火之下,可是我们已把大部分设备和全部的图书、乐器都安全的搬出来了……我们准备在十一月举行一个音乐会,一方面纪念建校,一方面以售票所得救济遭难同胞……。我们组织了一个乐队,希望经常开演奏会,把收入尽数献给慈善机关……我们应当再接再厉,有一分力可能做一分事业,所以我们现在又来创刊《音乐月刊》……,总之,我们不要悲观……我们要建设一个更伟大的音专(见编后说明②)。

《音乐月刊》出版了,由我主编兼校对员。但只出了四期,便出不下去了。于是改出一个不定期刊《林钟》。乐队成立了,但只排练,不能演出。“救济难童音乐会”于1939年5月4日才借美国教堂举行,听众满座,收入不差。此外又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修订教学大纲。新的教学大纲比较完整,提高了教学水平。其中由拉查雷夫教授执笔的钢琴教

学大纲订得最详尽,要求较高、较严。

萧先生带我去谒见了音专的第一任院长(音专原称国立音乐院)蔡元培先生,他年事已高,不能过问音专的事了,但仍然是音专的精神支柱。我们又为交涉教员之事,一起去找工部局乐队的领导人梅百器(M. Pacci),因为音专有不少器乐教师是他的乐队成员,最好和他打个招呼,以免他从中作梗。另外还希望他同意音专的同学每周免费去参观他们乐队的彩排。

音专迁至租界后未挂过牌子,对外用“私立上海音乐院”的名义,还刻了个假图章。萧先生自称“萧思鹤”,又叫我改名为“陈白鸿”。学校需要在法租界工部局注册,否则不许开办。他同我去工部局找到了华人教育处的处长法国人格罗布阿(Grobois),萧先生在介绍我时说:“这位就是私立上海音乐院的负责人陈白鸿先生,他是留法回来的,能讲法语,以后有事情请和他联系。”其实什么“私立”不“私立”格罗布阿心中完全明白。但他也问起经费来源,萧先生捏造了一位董事长——音专英语教师梁就明先生的丈夫黄兆鸿。格罗布阿是只能用一只假手拉小提琴的人,对于音乐学院的设立戒心较小,因此同意注册,事情就这样唬弄过去了。

于是学校表面上由我负责,萧先生退居幕后。自刘湛恩校长遇刺身亡后,萧先生预感到租界不是安全之地,而这场战争也决不是一两年所能结束的。1938年暮春,他决定去汉口向国民党的教育部请愿,将音专迁往桂林,或在桂林先办个分校,一旦音专在上海呆不下去,桂林便是一条退路。这时“孤岛”与香港之间尚有海路可通,萧先生乘船去香港,经广州,由粤汉铁路到汉口。但迁桂之建议得不到国民党教育部的同意,他只好又回香港,在旅途中曾遭敌机轰炸火车,幸未受伤,他就暂时留在香港治病。

这里我要插入一段痛苦的叙述,即黄自先生的逝世。正当萧先生去汉口时,黄自先生因病住进了红十字会医院。1938年5月,赵梅伯先生正在高恩路校舍三楼的教室中教合唱课,我在二楼办公室中接到医院的电话,说黄自先生病危,需要有人去给他输血(可能当时没有血浆),我不知道需要什么血型,便到合唱教室去动员同学,当即有十余名同学跟我抄近路连奔带跑地到了医院,供医生在我们中挑选。可惜太迟了,黄先生已经不行了。他死于伤寒,仅三十四岁,正是他才华焕发的时候!这段经

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

前几天我在杂志上看到谭小麟的歌曲发表了,又使我想起这么一件事来:黄先生死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和黄先生的几位学生在谭小麟的家里商量黄先生的后事。谭也是黄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他家是一座老式大洋房,客厅很高大,门窗都很厚重。我们正谈论间,突然有一扇门无风自开,呀然一声,我们都怔住了。当然我们都不信鬼神之说,但这件事也给我留下印象,至今未忘。

1938年暑假一开始,我携带学生成绩簿乘船去香港看萧先生,相见之下,不胜感慨。我发现他唇上的八字胡长得越发茂盛了。这八字胡是他“八·一三”以后留起来的,他说这是“纪念胡”。我们感到音专的前途茫茫,不知如何是好,可是数十位教职员和百多位同学都协力同心在维持这所全国唯一的音乐学校,我们岂能撒手不管。经过几天的认真磋商,萧先生要求我重返上海,共同下决心把音专维持住,他待秋凉病体稍好也要回上海。这时期许多人由上海涌向香港,有的人经香港转入内地,我也动过这个念头,可是有学校的担子在身,便逆流由香港回奔上海,我内心深处的确也对于这所音专(或者叫做风雨飘摇中的“象牙之塔”吧)很舍不得,所以才作了这个决定。抵沪时,到码头接我的有音专高年级学生也是我的好朋友章彦同志,和我的两位挚友潘子康和何复基同志(两人都是地下共产党员,何现仍在上海。)

萧先生没有失约,1938年秋后果然由香港带病回来了。这时学校在高恩路,他每周来校授两节课——“朗诵法”和“旧乐沿革”。

上海的救亡歌咏运动早已被租界当局禁止了,许多热血的人设法进入内地,富商巨贾乘船逃往海外,上海周围的炮声也早已愈去愈远,“孤岛”上出现一种反常的空虚寂寞、令人窒息的感觉,物价上涨,生活日益困难。而最令人难受的是对于抗战的真实消息简直一无所闻,报纸不敢报道,我们也都缺少“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高度政治远见。学校处于蛰伏状态,等待天明。

1939年“双十节”哪天,街上冷清清,国旗也没有敢挂。萧先生夫妇约了我夫妻俩到亚尔培路雅利餐馆共进午餐。他说这次聚会虽也算是庆祝“国庆”,实际上是庆祝我们两家的“家庆”(结婚纪念日),更实际地说,是因为近来营养不良,借此机会大家吃一顿罢了。

迁校于爱文义路后,他的健康日趋下滑,常见他着呢长袍,戴毡帽,裹围巾,架一副黑边眼镜,挟黑皮包,顶着北风,飘飘然从静安寺路向爱文义路踱来。他跨进办公室,坐下来,第一个动作便是掏出手帕来揩鼻涕,他好象整年在感冒中,嘴唇失去了红润,假门牙在黑胡子下显得更白,脸上的神色也更憔悴,肺结核在酝酿中爆发,潜伏已久的营养不良,导致了他1940年的死亡。

当时的音专师生

黄自先生是音专中很有影响的教师之一。我到音专之前即已久仰其名,“旗正飘飘,马正萧萧”的歌声常萦回耳边。到音专后我见他身穿长袍,态度和蔼谦逊,说话不多。他虽只比我大二、三岁,我常以长者视之。不幸相识不到一年,他竟与世长辞了!理论作曲组中于是只剩组长李惟宁一人了,幸好主科同学只有三、四人,李先生教作曲之余,仍能腾出时间来兼教几节钢琴。

钢琴组长查哈罗夫(Zakharoff)是特约教授,在当时的上海音乐界中也是一位权威。音专许多高材生多出他的门下。不久前吴乐懿同志回忆起他说,“他的教学法很好,每一步骤都十分得体,使学生循序渐进,按计划达到最后目的。他还乐于帮助贫苦学生。”他身材魁梧,风度豪放,但有时老气横秋。有一次我为了合唱课弹伴奏的事,当着大班同学和他顶撞起来,吵了十几分钟。我当时入世不深,“初生之犊不畏虎”,但还是把他说服了。他并不计较,不久后我的六岁儿子由他选拔进了音专的特别选科,并由他亲自教导,直至1941年他逝世为止。

在他领导下的钢琴组教员中,除一位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丁善德外,都是侨居我国的旧俄知识分子。他们是拉查雷夫(Lazareff)、皮利毕特可夫夫人(Pribitkoff)、阿萨可夫(Asakoff)、柯斯特维支(Kostevitch)和一位毕业于音专后赴比利时深造归来的萨哈罗华小姐(Saharova)。

声乐组由赵梅伯领导,他还兼指挥合唱队。声乐组中影响较大的是苏石林(Shushlin),他后来取得苏联护照。他教学生颇有办法,斯义桂就是经他培养的。周淑安先生是音专元老之一,这段时间她在家中为学生授课。另一位声乐教师是舍利凡诺夫夫人(Selivanoff)。

管弦乐组由大提琴教师余甫磋夫(Shevtzoff)

领导。小提琴教师黎扶雪(Livshitz)据说是奥尔(Auer)的门生。这两人因为课时较多而拿全薪,其余的都是拿兼课薪的。长笛教师丕且纽克(Pec-heniuk)、双簧管教师沙利且夫(Saricheff)、单簧管教师维尔尼克(Vernick)、大管教师佛丁拿(Fortina)、大号教师多波罗夫斯基(Dobrovolsky)等。他们大多数是工部局乐队的成员。萧先生当日决定在上海办校,就是想利用这些外籍教师的技术力量。当年我国没有自己的交响乐队,交响乐事业正处于启蒙时期,他们来音专兼课固然主要是为了拿“外快”,但客观上也给我们传授了技术。例如,我们的几位著名指挥都跟他们学过器乐:黄贻钧吹得一手好小号,是跟多波罗夫斯基学的;韩中杰也是一名优秀的长笛手,是跟丕且纽克学的;李德伦跟余甫磋夫学过几年大提琴;陈传熙跟沙利且夫学过几年双簧管。外籍教师中,除查哈罗夫拿校长级薪金外,其余的都和本国教师同样待遇,没有特殊的补助或福利,比起向外国请专家来教课要节省得多。

国乐组只开一门琵琶课,由朱英先生担任,他还兼训育主任。

文化课教师都是兼任的:国文教师龙榆生,英文教师梁就明,教育学和心理学教师鲁继曾,戏剧概论教师顾仲彝。

我刚到校时担任乐理课和视唱练耳课,黄自先生去世后,原由他担任的公共和声、音乐史、音乐欣赏等课都落在我的肩上,我成为全校音乐共同课的包干者了,每周要上十多节课,备课、改卷、教材等工作很忙。

同学中,钢琴主科生最多,声乐次之,管弦乐又次之,理论作曲生仅四、五人,国乐主科生更加凤毛麟角。这些同学在音专打下了基础,解放后得到党的不断教育培养和实践锻炼,先后从“象牙之塔”中解放出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艺术观,同时也提高了业务水平,有的且出国深造,再回来工作,所以现在多已成为我国音乐事业中的骨干,如李德伦、黄贻钧、韩中杰、陈传熙、吴乐懿、高芝兰、章彦、窦立勋、钱仁康、邓尔敬、张隽伟、马思聪、马思聪、葛朝祉、陆仲任等等同志,以及在海外的斯义桂和李蕙芳等,都是这一段时期中的音专同学。还有多人,因篇幅关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几年中音专年年招生,但人数不多,由于师

资和设备的限制，是填空补缺，出去几个就进来几个，每次能招一二十人就很不了起了。招生地点集中在上海，似乎从来也没有去外地招过，成为上海“孤岛”后就更不必说了。我回忆这几次招生的工作是正常的，至少可以说萧先生和我都没有徇私的行为和偏见。入学试先考主科，由全组的主科教师集体评分，然后才考乐理、视唱、国文、英文等。每次投考的人都较多，竞争颇烈。由于全国只此一家而又录取较严，所以考生们好象觉得榜上有名就已经是一种资格似的。入学后按学制分专修科和师范科两部分，专修科分高中部和本科，师范科分初级师范和师范本科。其实这两部分的课程基本上相同，许多合班课是混起来上的，只是专修科对主科的要求稍高，师范科则加设教育学和心理学，但这两门课的课时都有限，要求亦不严，有点形式主义。两部分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也几乎完全一样，并不是师范生一定要当教师，专科生则去当专家。当时没有毕业分配的事，毕业后自找工作，学校一概不管。但他们不至于有“毕业即失业”的情况，物以稀为贵，他们拿出音专这张印有一个希腊古琴、装璜很考究、盖上“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铃记”的大红印，还有主科教师、组长、教务主任和校长签名的毕业文凭，找个工作一般是不成问题的。

此外，音专设有选科和额外选科（亦称特别选科）。选科生要通过主科的入学试，入学后也可选修其他课程，学完主科后发给“修了证书”。额外选科生可不经入学试，但主科教师得同意收他，事实上等于主科教师的私人学生，学费归教师所有，只由学校代收而已。

音专没有全面实行学分制。文化课和音乐共同课必须按学年全部学完。主科和副科有一点学分制的意味。主科要学完初级、中级和高级，通过考试方得毕业，没有一定年限，一般总得学六、七年，有个别学生要学九年。

我不了解在我到校以前音专是如何抓“思想工作”的，我到校以后可以说没有“抓”过，只对业务抓得很紧。学校领导除忙于日常教学工作外，最吃力、消耗精力最大的工作是为学校的生存而奋斗，搬场、伪装私立、计划内迁、防备敌伪破坏、应付物价、沟通经费等。学生又尽是走读生，接触机会也较少。当然领导和某些教师的顽固的技术至上观点难免要影响学生，但我感觉到绝大多数学生都深明大义，并能刻苦攻读，学校在这几年中也没

有处分过任何一位同学。他们的爱国热情值得称赞，当“八·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上海的爱国人士在慕尔堂举行过一连串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音专的同学都一直踊跃参加。1939年音专举办“救济难童音乐会”，外界是有阻力的，敌伪当然要反对，租界当局也不希望多此一举。但音乐会终于举行了，全体同学不但积极参加排练和演出，而且在困难环境中，暗暗地推销入场券，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使音乐会在演出和收入两方面都得到成功。

1940年初夏，这时学校迁至爱文义路约有半年光景，萧先生鉴于时局日趋恶化，朝夕都可出现不测风云，为了便于高年级学生早日离开学校，乃决定于学期中途提前举行毕业考试，发给文凭，让这一批高年级生得以及早去参加抗日工作。从音专日后的遭遇看来，这一定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而且是具有一片苦心，令人难忘的。

萧友梅先生的临终

1940年入秋后，萧先生的体质更明显地下降了。他到校的次数越来越少，改用送条子的办法和我联系工作。下面抄录几张条子，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是很负责很细致的：

【其一】

查××系旧制本科毕业，已修了分门必修科目五十学分，未知核算新制，该得多少？今欲再入本科，须照新制办理。渠在校已满五年，将来如不能修了高级，亦可修了中级，如认为无须交教务会议解决，可以准其入本科……。此致

白鸿兄

鹤 八月十九日

【其二】

星期六上午有课之学生，如每周准其往兰心戏院听乐队练习，似与缺课有关系，但查是日有课或颇多高级生（尤其是理论学生），抑设法将上午功课移往下午？如何办法请酌定可也。此致

白鸿兄

鹤 十月十二日

【其三】

昨日接×先生电话，据言：欲在校上课而先生对他说已无空闲教室，但礼堂除外。故欲征求弟的同意，可否以礼堂作为×君授课之用等语。今晨

奋战六十载今朝当庆功 硕果累累雄心在远举

衷心祝贺上音建校六十年
老校友陈洪 一九八七年秋

来校,见总时间表内第三号课室星期三、六两日只有琵琶一小时,似可设法挪开,足够×君个别教授共十三小时之用。第壹礼堂只宜于全班上课之用,如用作个别教授,则电灯煤炭必增加许多,值兹经费拮据之际,在可以撙节范围内似应尽力节省,谅先生必以为然也,匆匆不尽,即候刻安。

弟鹤廿三日早十时

1945年我写过一篇《萧友梅先生五年祭》的文章,其中关于他的去世写得比较翔实,我现在倒不一定写得出来,所以不妨抄录几段旧文章来说明当时情况。

同年(按即1940年)的深秋,有一天他忽患感冒,发热不退,起初疑心是“上海病”。热度退去复来,来而复去,不久复来。医生劝他住进医院里去,他选定了一家比较廉价的体仁医院。他住在三层楼一间朝东北的病房,依然每天记挂着学校的事情,盼望有同人向他提出各种报告。

这时医生已经禁止他阅报。热度表和脉搏表扰乱着各人的心,接着就是验血,验大小便,照爱克斯光,忙乱了一阵,再接着打强心针,打葡萄糖针,输血,又忙乱了一阵,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徒增病人痛苦的“人事”而已,慈悲的死神已经在等候他,任何“人事”自延迟不了他们的会见。

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二月三十日凌晨,有人来敲我的房门(是王浩川同志),叫我马上到体仁医院。我起床披衣,在寒风中踉跄奔至体仁医院,见萧先生已经入于昏愤状态,不断地喘息着,喉咙里不时发出鸭鸭之声。萧夫人在榻旁泣不可抑。不久喘息渐平,鸭鸭之声渐弱,仅剩鼻孔里有一息尚存。他双目半闭,门牙外露,就在这种状态中他度过了阴阳的边界。东方的天空里出现鱼肚白的时候,值班的护士报告他已经断气,这样平凡地结束了这位中国音乐界元老辛劳的一生。

他死前两天和我作末一次交谈,他怀念着天气那样冷,学生们如何考钢琴,他记起了考试用的钢琴旁边有一个通天井的门户,门户有一条长缝,北风可以飒飒地吹进来,吹着弹琴者的手,让它僵硬动弹不便。于是他关照必须用硬纸裁一纸条,把门缝封闭。没有想到这一件事竟成了他的最后遗嘱!萧夫人告诉我,他说过这件事之后至死没有言语,关于他的家庭他没有提出一个字,他没有预立遗嘱。至于他的遗产,是两袖清风。

萧先生的遗体葬于虹桥路万国公墓,送殓者有其亲友及音专师生。墓碑刻着“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萧友梅先生之墓”,是叶恭绰写的。他生前未对我谈过宗教问题,但萧夫人是基督徒,故殡仪按基督教仪式进行,有牧师到场。我们各抛一块泥土于墓穴内,仪式以此告终。

萧先生去世后,我就得以脱身一切行政职务,只从事教课。校长由李惟宁继任,教务主任也由他亲自兼理。

萧先生遗一男一女,男萧勤先生,现侨居意大利,已是国际上有名的画家,女萧雪真同志在北京工作。去年我国音乐界在北京和上海举行了萧友梅先生追悼会,萧勤曾专程回国参加。不久前他从米兰给我来信,说他希望1984年萧先生百岁诞辰时,我国音乐界能再有所表示,到时他也要回来。

(原载《音乐研究》1982年第3期,略有改动)

编后说明

- ① 陈先生所用校名,实际在对外招生时仍用“上海音乐院”(参见1941年6月27日至7月1日的《申报》,《正言报》及《中美日报》的招生广告)。
- ② 此处地址有误,根据老职工王浩川同志证实,一处为福履里路(今建国西路)365弄1号,供总务部门用,一处为台拉斯脱洛(今太原路)217弄19号,供贮藏图书及唱片之用。